

September 2012

## On the Rationality and Casual Criticism in Poetry Commentaries in Song Dynasty

Shanshan Xie

Qiaobin De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Recommended Citation

Xie, Shanshan, and Qiaobin Deng. 2012. "On the Rationality and Casual Criticism in Poetry Commentaries in Song Dynast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2, (5): pp.57-62.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2/iss5/11>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 论宋代诗话的“闲评”特色与理性精神

谢珊珊 邓乔彬

**摘要:**“闲话”、“闲评”是盛行于唐末宋初的文化批评方式。“闲评”催生了以诗歌品评为主要内容的“诗话”,开创了以《六一诗话》为代表的随笔感悟式批评模式。诗话重考据、尚辨析的理性精神,寓批评于鉴赏、在摘句品评中发掘诗法理论的模式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影响深远。

**关键词:**诗话 闲评 趣味审美 理性精神

**作者简介:**谢珊珊,五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研究。电子邮箱:shanshanxie116@163.com

邓乔彬,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代文论、画论、唐宋文学研究。电子邮箱:dengqiaobin@yahoo.cn

**Title:** On the Rationality and Casual Criticism in Poetry Commentaries in Song Dynasty

**Abstract:** Casual commentaries and casual criticism are a prevalent mode of literary criticism at the turn from Tang Dynasty to Song Dynasty. Casual criticism developed into poetry commentaries whose contents centered around poem appreciation, and evolved into a mode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at was characterized by random writings, with *Liuyi Poetry Commentaries* as its representative. Poetry commentary places criticism into appreciation, and by emphasizing on historical research on and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text, it explores the poetic principles in commenting on dictions and exert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Key words:** poetry commentary casual criticism aesthetics of personal taste rationality

**Author:** Xie Shansha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Chinese Department, Guangdong Wuyi University,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shanshanxie116@163.com

**Deng Qiaobin** is a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Chinese, Jinan University,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theory and criticism of Chinese painting. Email: dengqiaobin@yahoo.cn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于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棻《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这五例中矣。”(“诗文评类一”1779)这段话非常精准的概括了中国古代文论的五种基本类型:一是刘勰《文心雕龙》重在理论、文体的理论型,二是钟嵘《诗品》重在品评历代五言诗及诗人高下等级的诗品型,三是皎然《诗式》以研究诗歌语言的格式技法的诗法型,四是孟棻《本事诗》重在叙述诗歌创作本事的“故实”型,五是欧阳修《六一诗话》、刘攽《中山诗话》涉笔成趣的诗话型。虽然这只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粗略梳理,但也大体勾勒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脉络与基本体例。按理说“后出转精”是事物发展的规律,而上述五类之中应以诗话所出最晚亦应最“精”,但历代

的不少学者认为,因“偶出绪余撰诗话”,使之成为一种闲谈之作,零碎散乱,不成系统,价值也就令人怀疑。人们看重的是可以与西方诗学一比的系统性理论,因此,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自是我国古代文论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甚而孤峰,而闲评随笔式诗话则被轻视。这种看法也决定了诗话研究的态势,并一直持续影响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

郭绍虞先生曾描述中国文学批评由产生而发展的历程:因整理和类聚区分而有了《艺文志》的《诗赋略》,这是批评的开端;因选择而确立标准而有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成为文学批评的滥觞;曹丕对建安七子的品第,更是开批评之风气;此后遂有确立批评标准、以批评的理论作根据的“为批评的批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1)。诗话“作为一种有关诗的理论”始于又盛于

宋代,如郭绍虞先生所说:“诗话之称,当始于欧阳修。诗话之体,也创自欧阳修”(“序”2),而欧阳修《六一诗话》开篇即表明了“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转引自何文焕 264)的创作宗旨。后继者对此群起仿效,司马光《温公续诗话》说:“《诗话》尚有遗者,欧阳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然记事一也,故敢续书之”(转引自何文焕 274),明确表示仿效《六一诗话》之意。其后的《中山诗话》亦如此,甚而一直影响到清代。因此,蔡镇楚先生在《中国诗话史》中总结道:“北宋时期即初期诗话之作,一般都沿着欧公《诗话》所开创的路线,以闲谈记事为主[……]即便是清诗话中的随笔式的‘以资闲谈’的著作,其数量也不少”(17)。

“集以资闲谈”的诗话何以大盛于宋?钱钟书先生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说:“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创作,也总在某种文艺风气里创作”(钱钟书 1)。要追溯闲评诗话产生的条件,探究其原因,当要回到唐五代与宋初的时代环境,因为那时的士人多追求休闲、享乐,士林中弥漫着嗜好闲评闲谈的文化风气。唐代以科举选拔人才,出身庶族的士人可以凭借文才登第,并踏上仕途,其中有的人在感悟了政治与人生后,以“中隐”思想行“吏隐”、求闲适,白居易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将“闲适诗”作为自己诗歌的三类之一,足可见其生活趣尚。五代时期,虽北方战乱频仍,但前蜀“郡府颇多,关河甚广,人物秀丽,土产繁华”(何光远 48),后蜀“赋役俱省,斗米三钱”,“村落间巷之间,弦管歌诵合筵社会,昼夜相接”(张唐英 56)。南唐“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司马光,《资治通鉴》8832),故能为士大夫文人提供闲适生活的经济基础。无论是前、后蜀还是南唐,都优待文人,南唐的君臣所尚更为高雅,遂为休闲文化的生成、发展创作了条件。北宋真宗、仁宗时期的士大夫反思晚唐五代最终乱局的成因,着力于道德、气节重建,追求“内圣”与“外王”的结合,事功意识与感情自律相辅相成,使得他们的精神境界、理想追求同晚唐五代的士夫文人判然有别。但由于赵宋王朝自立国起就大力推行右文政策,不仅拓宽了科举入仕的道路,大举推荐寒门士子,官员的待遇也远较前代优渥。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五“宋制禄之厚”条在历数宋代俸禄之制及其变迁后说:“此宋一代制禄之大略也,其待士大夫可谓厚矣。惟其赐给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赵翼 534)。待遇优厚,不仅体现在俸禄上,还体现在闲暇时间的充裕。据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一载:“祠部休假,岁凡七十有六日。”尚文抑武的治国方略,对强邻纳贡求和的和平环境,经济生产发展带来的丰厚物质条件,优裕的待遇和充裕的休闲时间,共同构成了士大夫追闲逐雅的社会土壤。这一时期的士大夫文人虽然受政党政治的影响,多有人生挫折,但禄厚责轻的优游生活也培育了他们享受生命、追求闲雅的审美旨趣,整体上呈现出富有近代色彩的生活态

度,结社休闲、雅玩风气不衰,“闲话”、“闲谈”式的文化评论也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成为文人“闲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闲评”作为一种文体,始于唐而盛于宋,多纪录奇闻异事,所涉广泛驳杂而兼有评论、分析,作者不以“立言”、“传道”为目的,而是将“评”视为“闲”业,因作为士大夫文人的一种休闲生活方式,此体遂由孳乳而渐多。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唐代留下的“闲谈”、“闲评”类文化评论有《资暇集》三卷(李匡义)、《灌畦暇语》一卷(姓氏不详)等(杂家类二 1016)。而此类著作之大盛却在宋代。我们只要翻阅一下宋人的笔记,就不难发现他们对闲评、闲谈的特殊嗜好,因之亦多以“杂记”、“漫录”、“夜话”、“谈记”等命名。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不完全统计,宋代的笔记有《东观余论》、《靖康素素杂记》、《猗觉寮杂记》、《能改斋漫录》、《西溪丛语》、《石林燕语》、《避暑录话》、《曲洧旧闻》、《冷斋夜话》、《齐东野语》、《师友谈记》、《紫薇杂说》、《常谈》等,有的则直接以“闲评”命名,如《瓮牖闲评》八卷。著作命名本身就是著述性质的定位与定性,宋人曾慥编《类说》(六十卷)更可见之。此书所收名为“闲谈”、“闲话”者就有《戎幕闲谈》一卷(唐韦绚撰)、《玉堂闲话》(五代王仁裕撰)、《秘阁闲谈》五卷(宋吴淑撰)、《牧竖闲谈》(宋景焕撰)、《国老谈苑》二卷(宋王君玉撰)、《灯下闲谈》一卷(宋无名氏撰)、《渔樵闲话录》二卷(旧题宋苏轼撰)等。影响到元代,还有此遗风,留有《闲居录》一卷(吾衍撰)。可见闲评在宋代不仅数量多,而且影响大。

从创作态度看,“闲评”是比较随意的即兴之作,是“偶有所得,随文生义”地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是文人闲暇时兴趣所至的录以成文。同时,“闲评”的各条目之间既没有内容上的关联,更缺乏系统的内在逻辑联系,是所谓“零砾碎璧”的“散论”。创作心态的从容不迫和文体的零散可谓是“闲评”最突出的特点。我们将这类“闲话”、“闲评”和北宋早期的诗话相比,不难看出其中文化闲论的精神一脉相通,以资闲谈的创作目的、闲散随笔的文体也是一致的。欧阳修在其《归田录》的自序中说:“《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可见与《六一诗话》的“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创作宗旨相同。因此,可以认为,诗话就是北宋休闲生活催生的文化“闲评”,是专门以诗文为品评对象的散论,是伴随着北宋士大夫文人的闲逸生活和宋代“闲话”、“闲谈”、“闲评”文化风气而生的诗歌创作漫谈。

欧阳修《六一诗话》因宋仁宗时期自由文化批评精神而催生,以之为开端,诗话逐渐演化成新型的诗歌批评。它们以诗歌作为特定品评对象,出以随笔的轻松形式,说来有趣,读来有理,在看似随意的闲谈中既展示了作者的学问、才情,又在任心闲话的日常语境中阐述精深的诗歌

理论,具有鲜明的现场色彩。因此,以其特有的闲谈形式,丰富有趣的内容,感悟式的理论表达,不仅得到北宋文人认可,更成为此后文人的普遍爱好。如郭绍虞先生所说:“宋人诗话,正因其性质之并不严肃,而其体制又极富于弹性,所以遂为论诗风气开了一个方便法门”(“序”4)。“六一诗话”和此后的《温公续诗话》、《中山诗话》、《后山诗话》、《临汉隐居诗话》等北宋诗话一起,共同开创并发展了随笔、闲评式的诗学批评,形成了趣味与理性交融的批评风格和随笔闲评的文本语境。自此,在看似随意的点评中探索诗学的规律与道理,进而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批评形式,并广泛运用于诗、词、曲等抒情文学的批评。

## 二

闲评式诗话有何特点,又应如何定位呢?回顾诗学批评史,我们不难发现,从诗话这一批评形式产生的北宋到现在,对其评价始终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和观点。肯定者认为“诗话应当是一种有关诗的理论的著作”(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1)。诗话的本质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论诗体裁”,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批评的一种专著形式”(蔡镇楚,《诗话学》29)。否定者则认为诗话“体兼说部”、“论事论辞两难分”,大多为“率尔”之作(王直方转引自郭绍虞,《宋诗话辑佚》34)，“往往徒资笑谈之乐,鲜有益于后学”(黄永存 408)。清代学者章学诚更进而从学问的角度断定:“为诗话者,又即有小慧而无学识者也”(章学诚 127)。似与俗文学在研究者心目中地位的上升不同,诗话并未能得到现代学界很高的评价。仅以诗话研究泰斗郭绍虞先生之见,对“闲评”类诗话就不乏批评,且主要集中在三个“不严肃”上:一是直指其创作目的不严肃,“‘以资闲谈’,便可知其撰述宗旨不严肃”(《宋诗话辑佚》2)。二是大多不署真名,造成诗话名称之淆乱,“诗话名称之淆乱,不仅在最初的几种诗话是如此[……]这恰好说明作者著述的时候,本是率尔操觚,初非有意著述,所以根本没有确定名称的需要[……]我们可以说,诗话著作的态度是并不严肃的”(《宋诗话辑佚》3-4)。三是因用于消遣与闲谈,功能不严肃,“《本事诗》一类之书,其内容尽管考核有据,然而仅备茶余酒后的消遣,其态度却又是游戏的”(《宋诗话辑佚》3)。即使在今天,研究者已经认可了诗话是诗文评的主要形式,然而,“初非有意著述”所成的随感式审美批评,还是难与体系完备的理论批评著作相并。

确实,纵观宋代诗话、尤其是此体初创时期,因其叙述模式与文体结构,当不是严格的批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六一诗话》、《中山诗话》所下的“体兼说部”判断,更可知“闲谈”与“说部”的关系,而因“宋人说部纷繁,大都摭拾琐屑,侈谈神怪”(“诗文评类一”

1019),诗话虽未必都“侈谈神怪”,却难免“摭拾琐屑”之病。可以认为,诗话实际就是现代文体意义上的闲谈随笔,是几个文人聚在一起或“论诗及事”,或“论诗及辞”。这种松散文体形式传递的“雅玩”精神,以及重在追求艺术审美感受的感性认识的特点,使诗话带上了浓重的闲情色彩,具有了重趣味的特点。

闲谈而不严肃,重趣而不言理,松散而不严密,似宜于论者对其所下贬抑。但是,这种“闲散”的杂论,并非闲戏之言,恰恰相反,由于论之所及皆出于自身兴趣,故对评论对象是爱之甚深而研之有得,又由于著者抛开了政治选择及主流话语的束缚,故可表达真知灼见,即所谓“剖析凿凿”,“尤多精审”,绝非著书立说之名利诱导下产生的作品可比,其独特的形式、独到的价值,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钱钟书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学史》唐宋卷编写时,曾亲自撰写了其中《宋代的诗话》一章。他说:“在各种体裁的文评里,最饶有趣味、最有影响的是诗话,是以‘轶事类小说’体出现的文评”(《中国文学史》2: 681)。诗话是诗的随笔,风格生动活泼,“它不是严肃正经的崇论宏议,而是随便亲切的漫谈杂话,语气轻松,文笔平易,顺手拈来,信口说去,随意收住,给读者以一种不拘形迹,优游自在的印象”(《中国文学史》2: 682)。钱先生在《读拉奥孔》一文中,进一步阐述随笔式话语表述的长处:“诗、词、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神智;把它们演绎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不妨回顾一下思想史罢。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断思想。脱离了系统而遗留的片段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断思想,两者同样是零碎的。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钱钟书 33-34)。

在“顺手拈来,信口说去,随意收住”,“不拘形迹,优游自在”,“随便亲切的漫谈杂话”中,“最饶有趣味”的“闲谈”诗话又逐渐发展为富有理趣的诗话。台湾学者徐复观先生说:“宋承五代浩劫,在文化中发生了广大的理性反省,希望把漂漂浮没的人生价值重新树立起来,以再建人自身的地位。这不仅出现了有如宋元学案上所述述的一批理学家,理学家以外的人物,也都带有这种倾向。文人与理学家中间,虽然出现过蜀党洛党之争,但宋代文人较唐代文人是更为理性的,在生活上是为较严肃的。理性的特征,是要追问一个所以然,必会发而为议论,以理性处理感情,在感情中透出理性,于是唐诗主情,宋诗主意,多议论,在这里应当找到根”(徐复观 45)。休闲逸乐固然是宋代文人的追求,理性反省也是另外一面,徐复

观先生上面这段话是在寻找唐宋诗歌之别的根由,也同样适用于对宋代诗话的观照。诗话固然以闲谈的形式而重视趣味,但同时又应注意:由于宋代以理学为一代之学术,宋人又极具理性精神,故即使是闲评式的诗话,亦不忘对感性认知作理性升华,因之使得趣味中复饶理性,有的更成为了“理趣”。可见,我们不能因闲评诗话内容的“生动故事性”和体制的“短小零散性”而怀疑它的理论色彩。钱钟书先生对诗话的“闲谈”、“趣味”与理性融合的特点,有过系统精辟的论述。他说宋代诗话往往“写得娓娓动人,读着津津有味,”他还认为随着宋代诗话的发展,“‘轶事类小说’的成分逐渐减少,而文学批评的成分相应地加多。它由杂记漫谈慢慢地变为较有纲领的理论阐释”(《中国文学史》2:683)。他明确指出:“只要把《六一诗话》跟《沧浪诗话》一比,就知道宋代诗话有多少发展。严羽表面上还是用随笔的风格,用亲切平易的语气,还像坐在软椅里聊天,不像站在讲台上说教,而实际上已经不是‘闲谈’,而是在‘深谈’,不是拉杂讲些趣事佳句,而是阐明有系统、有纲领的文学见解了”(《中国文学史》2:684)。可见,诗话到了南宋,更是大大发展了理性精神,借助原有的形式,却不失为“有系统”、“有纲领”,是以“闲谈”中的“深谈”表达其文学见解。

的确,“诗话”或非专业人士的专业评论,甚至大多标榜创作目的“以资闲谈”,多以闲评心态来撰述,然而,恰恰是诗话融消闲娱乐于理性批评的特点,“闲”中带“趣”,“趣”中有“理”的审美趣味,才赋予接受的广阔空间,在读者喜欢阅读的同时,也给诗话发展带来无限生机。因此,笔者以为:闲评式的诗话作为富有中国特色的古代文学批评形式,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都是显而易见的。诗话之所以能逐渐发展成为宋代文学批评的一代之胜,是顺应了当时文人闲适、闲雅、闲评的内心需求;从文体角度看,诗话富有文学性的表达与批评对象的高度契合,使之具有了易写、易读、易接受的批评智慧与价值;从审美角度看,诗话趣味中饶理性的特点,又使其具备了理性精神和富有中国特色的诗学智慧。总之,诗话体现了文学批评史的与时俱进及时代特色,表现出与宋代文人心灵高度契合的历史价值,甚而可以说更能展现出古代文学批评的民族性。

### 三

章学诚曾以“诗话”“通于史部之传记”、“经部之小学”、“子部之杂家”和“大略不出论辞论事”(“文史通义校注”559)来概括诗话之特色。的确,闲评诗话最初标榜“以资闲谈”,但其内容历经“述事”而“论辞”,由“诠释名物”到“摘句批评”的发展,并且形成了自身的批评个性与叙述特点,即闲谈之中蕴含诗理,趣味中显见理性精神。因此,我们对其率尔操觚、初非有意著述之特性,不应执

之不放,而应发见其闲谈外表下的深刻见解,所蕴含的考辨、文献价值,对诗歌创作和鉴赏的真知灼见,充分肯定其对古代文学批评的贡献。

首先,闲评诗话具有特定的理性表达:重考据、尚辩驳、正讹误。

郭绍虞先生在《宋诗话考》、《宋诗话辑佚》中,考证、收录了宋人诗话139部。这些诗话、特别是早期诗话,大多可断为文人消闲心态下的感悟之作,虽缺乏《文心雕龙》、《诗品》的严密逻辑和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宋代士人往往擅长于将美学与哲学连结,将消闲的生活与理性审美贯通,以他们集文人与学者于一身的身份,以更加冷靜的审美态度及更加理性的考据、辩驳表达其求“理”的精神。闲评类著作如袁文《瓮牖闲评》,“其书专以考订为主,于经史皆有辨论,条析同异,多所发明。而音韵之学尤多精审,凡偏旁点画,反切训诂,悉能剖别于毫厘疑似之间。其所载典故事实,亦首尾完具,往往出他书所未备”(“杂家类二”1020-1021)。曾慥《类说》亦“[……]精于裁鉴,故所甄录,大都遗文僻典,可以裨助多闻。又每书虽经节录,其存于今者以原本相校,未尝改窜一词”(“杂家类七”1061)。虽此类著作多如《瓮牖闲评》颇有“杂论因果怪异”的内容,但因既有对经典、历史、方物、习俗、轶事趣闻的记载与品评,也有对各种文化艺术现象的考证杂论,可谓“网罗四部”、“镕铸群言”,大多是主流文化无暇顾及的零散文化现象。可见,“闲评”类著述并非“闲”而无“学”,而是“闲”中求真,“闲”中求理,其理性精神与学术价值自是难以怀疑。

“闲评”类的诗话固然是专谈或多谈与诗相关者,却也涉闲评类著作的一般内容,亦如“闲话”体的评论,其理性精神,体现为重考据、尚辩驳,用严谨认真的态度以正讹误。最早对闲评诗话特征作出评价概括的当是宋代的许颢,其《彦周诗话》开篇就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记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接着又补充说:“若含讥讽,著过恶,消纒繆,皆所不取”(转引自何文煊378)。若谓后者主要体现了写作态度的端正,那么前者则多有尚辨而重考的理性精神。许颢的这段话,应该是对诗话内容最准确、简洁、最贴近事实的概括,也是诗话科学态度与理性精神最直接的体现。仅以北宋两部诗话来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认为《中山诗话》“此编较欧阳、司马二家虽似不及,然放在元祐诸人之中,学问最有根柢。其考证议论,可取者多,究非江湖末派、钩棘字句以空谈说诗者比也”(“诗文评类一”1781)。而《临汉隐居诗话》虽有“党熙宁而抑元祐”之病,却能“引韩愈诗证《国史补》之不诬,引《汉书》证刘禹锡称卫綰之误,以至评韦应物、白居易、杨亿、刘筠诸诗,考王维诗中颠倒之字,亦颇有可采”,故接之云:“略其所短,取其所长,未尝不足备考证也”(“诗文评类一”1782)。至如许颢所言“备古今”,是指记述古今的诗歌故事,包括诗人个体的思想品德,轶事

趣闻,以至订正诗歌作品流传的讹误。而对不客观、有偏见或态度不严肃、甚至错误的作品均不收入。

宋代早期诗话,内容中涉及炼字炼句的鉴赏很多,对用事的考证也不少。如《六一诗话》开篇对“莫玉五回朝上帝,御楼三度纳降王”诗句内容的详尽、严密考证(欧阳修,转引自何文焕 264);《温公续诗话》对《九僧诗集》九僧之名的详尽考证(司马光转引自何文焕 280);《中山诗话》对“请钱不早朝”中“请”字源流、含义、读音的考究探索,皆为人所叹服(刘攽转引自何文焕 288-89)。早期诗话中,还载有许多诗话作者平日谈论论诗时遇到的疑问与思考。如《六一诗话》对“尖檐帽子卑凡厮,短鞦靴儿未厥兵”语义的疑问,对“袖中谏草朝天去,头上宫花侍宴归”为求好句而不顾事理的质疑,明确指出“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欧阳修转引自何文焕 269)。《温公续诗话》中郑文宝《经未阳子美墓诗》时间与事实相忤所引起困惑的叙述,《中山诗话》对李商隐《锦瑟诗》本意的探究等。这些都与朱熹总结的宋人的理性思维方式相符,他在《答吕子约书》中就说:“莫问他是何人所说,所尊所亲,所憎所恶,一切莫问,而唯本文本意是求”。

闲评式诗话的零散考据和带有浓厚辨析色彩的论述,表现出不迷信、不盲从、唯本是求的理性精神,是善于独立思考的态度。作者们以思辨的眼光多角度、多层次地审视评论对象,将赞美与批评有机地融为一体,不以自己的好恶为批评标准,而是重视客观事实,在重理节情的理性思维指导下实事求是地进行文学评论。王水照先生在《宋代文学通论·绪论》中评价宋人这种精神特征时说:他们“表现在对不唯经,不唯圣的独立思考精神的崇奉上。宋人普遍具有自主、自断、自信、自豪的文化性格,不以圣贤之说、社会成见来替代自己的思考”(王水照 22)。虽“闲评”亦能体现上述精神特征、文化性格,自是很可宝贵的。

其次,“闲评”诗话的理性精神,又表现为品诗句、谈诗法等特有的理性鉴赏方式。

蔡镇楚先生曾说:“诗话虽然有‘论辞’‘论事’之分,然而其真正价值,却不在于‘论事’,而在于‘论辞’,在于其中所闪烁着的诗歌理论的光辉”(“诗话学” 29)。初期诗话虽以叙事为主,但在评诗论事的只言片语中,也时常流露出自己的文学见解,在品诗句的过程中对诗法理论做总结概括。如诗话的开山之作《六一诗话》总共只有二十九条,却几乎涉及诗歌写作的所有问题,诸如语言、音韵、风格、内容,创作的过程、方法,以及诗歌的阅读与欣赏,诗歌的“自然性”、“真实性”等。在即事论诗的话语间,在摘句赏析的字句中,处处闪现着诗歌理论的火花,其中许多观点成为重大的理论命题而传承至今。许颢所说的“辨句法”,则是指由辨析句法探讨诗歌创作的风格与方法,此类在诗话中甚多。

《六一诗话》对诗歌创作提出过一系列的主张,最有

影响的要算“诗穷后工”之论。继韩愈“不平则鸣”说之后,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进一步明确提出诗“愈穷而愈工”,并在《六一诗话》中将这一理论运用于评点孟郊、贾岛、谢伯初、梅圣俞等人创作。他说谢伯初:“以诗知名[……]颇多佳句[……]而仕宦不偶”(欧阳修转引自何文焕 270-71)。评介梅圣俞诗:“梅穷独我知,古货今难卖。”这一理论,和欧阳修“事信言文”强调诗歌创作要注重内容的真实可信是一致的。强调诗歌创作要从现实生活出发,反映自己的真情实感。他称道孟郊诗《谢人惠炭》中“暖得曲身成直身”一句“非其身备尝之,不能道此句也”(欧阳修转引自何文焕 266)。而“袖中谏草朝天去,头上宫花侍宴归”虽然句子佳美,却有违情理而显得可笑(欧阳修转引自何文焕 269)。类似鉴赏中寓有批评,批评中又带有戏谑调侃的理论,在诗话中随处可见。比如“鬼作人语人作鬼语”(王直方转引自郭绍虞,“宋诗话辑佚” 6),“诗贵圆熟”(王直方转引自郭绍虞,“宋诗话辑佚” 15),“诗不厌多改”(王直方转引自郭绍虞,“宋诗话辑佚” 50)等说,皆多为人所知、所推。欧阳修自是大诗人,兼长于创作与赏鉴,即使是政治家、史学家的司马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以其《温公续诗话》“非斤斤于词章之末者。而品第诸诗,乃极精密”(“诗文评类一” 1781)。

同时,诗话中的理论并不局限于诗,而是常常将各种艺术加以比较,创造性地提出一些见解。如《王直方诗话》第 111 条“东坡论诗画”:“文忠公盘车图诗云‘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转引自郭绍虞,“宋诗话辑佚” 41)。第 11 条“书法诗格”:东坡云“书之美者莫如颜鲁公,然书法之坏自鲁公始;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转引自郭绍虞,“宋诗话辑佚” 4-5),136 条“诗文必成一家”:宋景文云:“诗人必自成一家,然后传不朽,若体规画圆,準矩作方,终为人之臣仆。”故山谷诗云“文章最忌随人后”,又云:“自成一家始逼真。”诚不易之论”(转引自郭绍虞,“宋诗话辑佚” 52),这些既是诗话作者对诗歌鉴赏的体认,也是寓批评于鉴赏的结果。不仅在当时是富有创造性的理论见解,即便在千年之后的今天,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恰如郭绍虞先生评价《六一诗话》时所说:“至其《诗话》中论诗之语,则多不刊之论。许印芳《诗法萃编》录其写难写之景,会不尽之意诸语,甚称其得文章秘要,则知此虽欧氏不经意之作,固亦自有精义可采矣”(“宋诗话考” 3)。又说:“宋人论诗每偏于艺术,复崇尚自然,其义实自欧氏发之。欧氏于诗不没西昆体之长,而复主张李杜豪放之格,其能形成一代诗风非无故矣。要之欧氏学有根柢,故於是书虽取随笔体裁,不成系统。然细加细绎,不难窥其全貌,正不能以此为不甚经意之作而轻率视之”(“宋诗话考” 4)。

总之,虽如前所引,郭绍虞先生多次有“不严肃”的批

评,但他还是充分肯定了宋代诗话的贡献:“他们的著作态度虽不严肃,而论其材料与作用,却并非仅助茶余酒后谈资。论其考核有据,阐明作诗之本事,或网罗散佚,吉光片羽,赖以仅存,则有裨于文学史的研究。论其上下古今,衡量名著,摘举胜语,时于其间流露的一己之文学见解,则又有裨于文学批评研究”(“宋诗话辑佚”4),“在轻松的笔调中间,不妨蕴藏着重要的理论;在严正的批评之下,却多少又带些诙谐的成分。这是一般撰著诗话者所共有的态度,至少,尤其在宋人是如此”(“宋诗话辑佚”3)。对于生自闲评环境中的诗话,对其考据、订讹的文献价值,法度、鉴赏的理论价值,都实是大可发掘、梳理的。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蔡镇楚:《中国诗话史》。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

[Cai, Zhenchu. *A History of Chinese Poetry Commentaries*. Changsha: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s Publishing House, 1988.]

——:《诗话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

[———. *The Study of Poetry Commentaries*. Changsha: Hunan Education Press, 1990.]

郭绍虞:《宋诗话考》上卷。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Guo, Shaoyu. *Textual Investigations into Poetry Commentaries in Song Dynasty*. Vol. 1.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9.]

——:“绪论”,《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 “Introduction.”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1979.]

——:《宋诗话辑佚》,郭绍虞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 *Uncollected Poetry Commentaries of Song Dynasty*. Comp. Guo Shaoy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何光远:《鉴戒录》卷七,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He, Guangyuan. *Records of Admonitions*. Vol. 7.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5.]

黄永存:“碧溪诗话跋”,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Huang, Yongcun. “Epilogue to Poetry Commentaries by Gongxi.” *A Sequel to Poetry Commentaries across Dynasties*. Vol. 1. Ed. Ding Fubao.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第二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Literary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 2.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ress, 1962.]

刘攽:“中山诗话”,何文焕《历代诗话》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Liu, Ban. “Poetry Commentaries by Zhongshan.” *Poetry Commentaries across Dynasties*. Vol. 1. Ed. He Wenhu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欧阳修:“六一诗话”,何文焕《历代诗话》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Ouyang, Xiu. “Liuyi Poetry Commentaries.” *Poetry Commentaries across Dynasties*. Vol. 1. Ed. He Wenhu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钱钟书:《七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Qian, Zhongshu. *Seven Pieces Patched Together*.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1994.]

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小说笔记大观》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ed. *Collected Notes and Stories from Song & Yuan Dynasties*. Vol. 1.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2001.]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七〇。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Sima, Guang. *Comprehensive Mirror to Aid in Government*. Vol. 270.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6.]

——:“温公续诗话”,何文焕《历代诗话》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 “Poetry Commentaries by Sima.” *Poetry Commentaries across Dynasties*. Vol. 1. Ed. He Wenhu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

[Wang, Shuizhao. *A Critical Survey of Literature in Song Dynasty*. Kaifeng: Henan University Press, 1997.]

王直方:“王直方诗话”,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Wang, Zhifang. “Poetry Commentaries by Wang Zhifang.” *Uncollected Poetry Commentaries of Song Dynasty*. Comp. Guo, Shaoy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徐复观:《中国文学论集续编》。台北:台北学生书局,1981年。

[Xu, Fuguan. *Second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on Chinese Literary*. Taipei: Taipei Student Book Company, 1981.]

(下转第69页)